

祈福：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新探^{*}

常建华

摘 要：新清史强调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接续元朝传统的看法可以商榷。元明以来，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的圣地，在清代，五台山最重要的庙宇菩萨顶改为喇嘛庙，以其为首形成了黄庙体系。康熙帝五次巡游五台山，进香礼佛，以绥服信仰喇嘛教之蒙古，意在调适满、蒙、藏、汉四者的关系。此外，清帝与五台山的联系点，在于清帝被藏传佛教认定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意味着正式承认清帝对中国的统治，而五台山则是文殊菩萨的道场。康熙帝五台山礼佛，不仅是为民祈福，而且是为太皇太后、皇太后祈寿，为本人祈求福佑。康熙帝巡游五台山御书寺额、碑文、诗歌以及支持续修山志也是再造圣山。建构满汉蒙藏多元一体国家形态是康熙帝巡游五台山的追求。

关键词：康熙 巡游 五台山 文殊菩萨 礼佛

山西五台山，又名清凉山，作为佛教传入中国最早建立寺庙的名山之一，是中国佛教文化的象征。传说五台山是文殊菩萨演教之所，建有大文殊寺，即菩萨顶，属于佛教圣地。五台山也是中国内地藏传佛教喇嘛教的重要场所。康熙皇帝五次巡游五台山，进香礼佛，构成了与其他出巡五方有所不同的带有宗教色彩的类型。由于顺治帝出家五台山的传说，更为五台山涂上了神秘的色彩。康熙帝之后，乾隆、嘉庆两位皇帝也多次巡游五台山，俨然形成清朝家法。

康熙帝以及清帝巡游五台山的活动引起欧美学者的关注，大卫·法夸尔 1978 年的文章《清帝国统治中皇帝的菩萨扮相》^①指出，元清皇帝在蒙语文献中被广泛传为文殊菩萨的化身，清帝资助并造访五台山的主要原因是意图在蒙古人中间散播“文殊菩萨即皇帝”的信念。新清史着眼探究清朝统治者的内亚统治模式遗产，继承并光大了上述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学系博士候选人、德国籍学者柯丽娜，发表了《康熙为什么去五台山？赞助，

^{*} 本文系 2015 年 7 月《历史研究》编辑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举办的“清代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历史建构”会议论文。

^① David Farquhar, “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g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8, no. 1 (Jun. 1978), pp. 5-34.

参拜以及清前期藏传佛教在朝廷的地位》^①一文，依旧关注皇帝文殊菩萨身份和对五台山资助之间的关系，探讨了三个问题：明与清前期资助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共同点、皇家对汉传佛教的持续赞助、康熙帝西巡的多重含义。该文指出新清史学者认为对藏传佛教的资助是统治朝代标志性特征之一，然而清前期的皇帝对五台山藏传佛教的赞助，表现出他们与明朝对五台山佛教机构赞助的连续性。清朝前期皇帝同时资助藏传及汉传佛教的僧院，康熙帝的公开碑刻强调清朝对五台山护国仪式的慷慨赞助，和前朝一样，五台山继续作为护国仪式的重要中心。康熙帝对五台山藏传佛教偏爱的原因更多的是希望在五台山用密宗的方式，继续历史悠久的（汉族）护国传统。早期清朝皇帝对五台山藏传佛教的特别资助，终归只是遵循他们视作中国传统的规则。康熙帝五次巡游五台山不能一般性地视为参拜、朝圣，除了陪同祖母的那次具有明显的宗教性外，其余的还有大量多元的活动，资助寺庙举办仪式，只是他五台山之行众多活动中的两项。将康熙帝巡游置于皇帝巡游传统的背景中考虑，是理解皇帝西巡时不同意识形态活动的关键，康熙帝到五台山仅仅是更大的帝国巡视工程的一部分。

中国学者对于康熙皇帝巡游五台山的活动也有一定的研究。吴兆波指出，康、乾二帝到五台山次数仅比南巡少一次，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并不比南巡低，但是史学界对它的评价大多认为只是进香拜佛而已，认为清帝去五台山的用意决非仅仅是礼佛。强调康熙皇帝因“曲承太皇太后瞻礼五台山之素心”而开始的五台山之行，使人联想到顺治出家五台山的传说。多带皇子随行等行为也值得探讨。他强调“西巡五台山，不仅使五台山寺庙的发展再创辉煌，同时对弘扬佛教，通过佛教维系与蒙藏等民族的团结，安定西北边疆起了一定的作用”。^②王铁牛探讨康熙皇帝与五台山的关系，视野开阔，更具综合性，认为清朝特别尊崇喇嘛教，特别敬奉文殊菩萨。康熙帝“五次朝台，祝愿慈亲福寿绵长。祈祷国家繁荣昌盛，虽为私愿，却利国利民。特别是他尊崇喇嘛教，利用喇嘛教怀柔和团结了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不仅对当时的国家安定起到了巨大作用，也为我国后来疆土的确定和民族的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功不可磨灭”。^③以上二文属于概论性的综合论述。另有王敬雅论文重点在梳理康熙皇帝西巡五台的具体时间、过程，并根据时代背景，探讨其数次西巡的目的和意义，认为“康熙皇帝五次巡行五台，分别发生在国家初平之时、靖边之时、承平之时及朝内夺嫡之时，每次西巡都有特殊的背景和意义，而地方官员接待方式的变化，也是康熙朝政治转向的一个侧影”。^④该文提出了一些新问题，需要继续探讨。

不难看出，康熙帝巡游五台山问题，涉及清朝的民族、宗教问题，与国家统治方式以及明清之际历史的断裂与连续密切关联。王敬雅的论文新出，但是并没有讨论西方学者的上述争论。笔者赞成柯丽娜对新清史学者的商榷，并在此基础上就康熙皇帝巡游五台山问题进一步讨论，首先就礼佛祈福的意义申论，接着提出清廷延寿祈福与圣山再造两个新问题讨论，最后就巡游五台山的多元活动作些补充，认为祈福应视为康熙帝巡游五台山的政治标签，跨越了民族、宗教，上升到国家认同的政治高度。^⑤

① Natalie Köhle, "Why Did the Kangxi Emperor Go to Wutai Shan? Patronage, Pilgrimage, and the Place of Tibetan Buddhism at the Early Qing Court," *Late Imperial China*, vol. 29, no. 1, 2008, pp. 73-119.

② 吴兆波：《清朝皇帝西巡五台山——从清宫藏五台山档案史料谈起》，《佛教文化》1998年第4期。

③ 王铁牛：《康熙皇帝与五台山》，《五台山》2006年第8期。

④ 王敬雅：《康熙西巡五台山若干问题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4年第1期。

⑤ 参见常建华：《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清史研究》2010年第4期。

一、巡游五台山礼佛祈福的意义

康熙帝总计五次巡游五台山。第一次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二月十二日至三月初六日,计25天。拜佛进香,为秋季太皇太后巡视五台山做准备。本次出巡命皇太子胤初随驾启行。第二次为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至十月初九日,计28天。奉太皇太后进香,拜佛还愿。太皇太后,即康熙帝祖母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出生于科尔沁蒙古,在清朝皇位继承、辅助幼帝等方面功劳卓著,时年71岁。第三次为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至二月二十三日,计26天。进香,归途巡视浑河河堤。本次出巡命皇长子胤禔、皇三子胤祉随驾。第四次为四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初一日,计33天。进香,阅永定河、子牙河。本次出巡,命皇太子胤初、皇四子多罗贝勒胤禔、皇十三子胤祥随驾。第五次为四十九年二月初二日至三月初五日,计34天。进香,巡视民情。本次巡游命皇太子胤初、皇三子和硕诚亲王胤祉、皇八子多罗贝勒胤禔、皇十子多罗敦郡王胤祜、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固山贝子胤禔随驾。

在这五次巡游五台山之中,最能表现出巡游意义的是二十二年的巡游,由于首次巡游五台山是为了第二次太皇太后出巡做准备,所以这两次离得很近,均在康熙二十二年进行,可以放在一起分析。二十二年的巡游五台山,如果联系到前一年康熙帝东巡盛京、吉林谒陵祭祖,部署边务,慰抚蒙古;再联系到后一年巡狩泰山,南巡江南,于江宁谒明太祖陵,至曲阜祭祀孔子,同年还出巡了畿甸,就会感到二十二年巡游五台山不同寻常,应当是这前后一系列活动中的一环。

东巡是以云南底定,海宇荡平,躬诣祖陵告祭先人,南巡旨在标志一统天下开始新的统治,^①巡游畿甸意在表达清朝勤政爱民、重视农业、关心民生的政治特色,塑造了康熙帝忧国忧民的光辉形象。^②而二十二年巡游五台山也是发生在二十年平定三藩、二十二年台湾即将归顺之时,因而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③早在康熙十二年十二月,惊恐于“三藩之乱”的康熙帝就派侍卫到五台山拈香礼佛,还修建“祝国佑民道场”。^④十七年又书写“五台圣境”匾额派钦差送往菩萨顶。既然“三藩之乱”爆发后祈佛来“祝国佑民”,平定三藩后再次供佛还愿也是应当的。不过二十二年二月在五台山“特命修建上祝太皇太后延寿万寿无疆道场三日”则是重点。^⑤

第三次巡游五台山还是因为战争结束。三十六年二月,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噶尔丹穷途末路,病死草原。五月,康熙帝回京,谕以外寇荡平,唯以安定地方、抚循百姓为急务。七月,以平定朔漠遣官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永陵、福陵、昭陵,又遣官告祭先师孔子。三十七年正月巡游五台山,命皇长子往祭金太祖、金世宗陵。十月东巡,谒永陵及盛京二陵。清廷有重大事情多告祭祖先,感谢祖先庇佑,平定三藩如此,荡平噶尔丹又是如此。所以与东巡相近的第三次巡游五台山,应是因战胜噶尔丹进行的。此次礼佛,康熙帝命“建护国裕民道场三永日”。^⑥

① 常建华:《新纪元:康熙帝首次南巡起因泰山巡狩说》,《文史哲》2010年第2期。

② 常建华:《京师周围:康熙帝巡幸畿甸初探》,《社会科学》2014年第12期。

③ 郭松义也指出康熙帝不断前往五台山礼佛“内中亦具有政治含义”,参见郭松义主编:《清代全史》第3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④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3《崇建》,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台北:丹青图书公司,1985年影印本,第30册,第182页。

⑤⑥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3《崇建》,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第183、192页。

第四次巡游五台山也不能忽视。四十年有两件大事完成，一是五月永定河工程告竣，二是十二月黄河河工大致完成。河工是康熙朝的大事，康熙帝曾以三藩、河工、漕运为三大国政，可见对于河工的重视。四十一年正月巡游五台山，或许与河工的完成有关。

第五次巡游五台山可能是为皇太后庆寿。四十九年正月，皇太后七旬大庆，康熙帝非常兴奋，在皇太后宫进宴，康熙帝敬酒还跳了民族舞蹈蟒式舞。正月二十四日，康熙帝谕山西巡抚苏克济：“数年以来，朕曾欲谒五台山，但耽搁未去。今年为皇太后七十诞辰，现正无事之际，朕将往谒。”^① 二月巡游五台山，当是与皇太后的寿庆有关。

巡游五台山是如何表达出上述愿望的呢？《康熙起居注》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记载康熙帝为太皇太后“代礼诸寺”后，起居注官说到：

洪惟太皇太后，至仁弘德，普育群生，以五台为梵刹名胜之地，积诚瞻礼。粤有岁时。皇上纯孝性成，仰礼睿念，遂于春二月躬诣〔五〕台山，致祈景福。又涣发帑金，修葺寺宇，不以纤毫累民。……迄告成事，乃于是月恭奉太皇太后銮舆临幸……沿途葺理，无非曲承太皇太后瞻礼五台之素心，以求上慰圣怀，茂绥第祿……慈孝相成，神人胥悦，真史册中希觐之盛事也。^②

即通过巡游五台山礼佛，以“致祈景福”。由于太皇太后在爱新觉罗家族地位最高，在清朝政治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实际上是真正的“国母”，^③ 其品德“至仁弘德”，可以为国民祈福。所祈之福，则是战后的天下太平，人民幸福，更重要的是清朝国祚亿万斯年，长久治安。由于五台山是兼有汉地佛教和藏传佛教道场的佛教圣地，在五台山的礼佛具有认同佛教的意义。而出巡本身，由于太皇太后年事已高，礼佛祈福更具诚意，加上康熙帝“纯孝性成”，演绎了一段“慈孝相成”的动人故事，倡导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普遍的人伦道德。

为了五台山礼佛，二十二年四月，康熙帝特旨发内帑 3000 两重修了五台山的中台演教寺、东台望海寺、南台普济寺、西台法雷寺、北台灵应寺等庙宇，亲撰各寺碑文。这些庙宇“财自内出，不涉经费，工以佣给，役弗违农，是以工敏于事，而民若不知，秋八月告落成焉”。^④ 九月，第二次巡游五台山，庙宇一新，实际是正式登台礼佛。虽然太皇太后只是到达中途，但是发挥了康熙帝修庙礼佛的作用：“上以昭景福于慈闱，下广嘉惠于兆庶，垂示于亿万斯年尔。”^⑤ 以太皇太后名义为民祈福，方便民众拜佛，求得佛的护佑。

从康熙帝的角度看，他的五台山礼佛是为了祖母祈福并发挥佛教的教化作用。康熙四十年，他在《御制清凉山新志序》中说：“宇内称灵山佛土最著者有三，峨嵋、普陀，而五台为尤盛焉。我世祖章皇帝上为慈闱祝釐，下为苍生锡福，赐金遣使，屡沛恩施。朕数经驻蹕兹山，为两宫祈康宁福祉，因而登五峰，陟台怀，各为文勒石以纪之……尝念佛教以清净慈惠为本，以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 1258 号《山西巡抚苏克济奏报在五台各庙念经祝寿折》附上谕一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第 668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第 2 册，第 1073—1074 页。

③ 康熙十九年，达赖喇嘛曾进请太皇太后安并献佛骨等物奏书，太皇太后以“自太宗皇帝以来，宫内向无此等另行具疏进贡之例……此奏与例不合”，概行退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 年，第 85、89 页）从达赖喇嘛对太皇太后的尊重，也可证明太皇太后的地位之高与影响力之大。

④ 《北台灵隐寺碑》，《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 23，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 年，第 1 册，第 212 页上。

⑤ 《北台灵隐寺碑》，《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 23，第 1 册，第 212 页上。

戒定智慧为宗，亦有裨于劝善远愿。”^① 这里提到康熙帝的父亲顺治帝，曾有顺治帝出家五台山，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是探望父亲的传说，已为孟森等史家辩驳，证实顺治帝死于天花，死后火葬。^② 康熙帝在这里强调的是顺治皇帝重视佛教，为五台山“赐金遣使”，同样也是为母亲与百姓祈福。在这个意义上康熙帝是继承父亲的做法。

射虎川因康熙帝首次巡游五台山途中射虎得名，于是当地“相率为浮屠之宫”。^③ 二十四年，由于康熙帝发帑金3180两建台麓寺，撰写了碑文，并命设立大喇嘛一员，格隆班第25名，焚修香火。^④ 特别是五台山的菩萨顶文殊院，相传文殊示现于此，殿庑庄严弘邃，三十七年康熙帝赐菩萨顶供银千两，为其撰写《菩萨顶大文殊院碑》，内称：“我朝建鼎以来，岁有赐给，为国祝釐。”^⑤ 指出该寺院的重要性。康熙帝还动用内帑3000两重修五台山的殊像寺以及碧山寺，亲撰寺院碑文。康熙帝指出佛寺“有裨于劝俗，聿弘觉善之门”。^⑥ 后来康熙帝还动用内帑，重修了棲贤寺、显通寺、涌泉寺、广宗寺、白云寺，并亲撰寺庙碑文。康熙帝通过尊崇佛教，以达到“祝慈有庆，九天之寿域长新；绵祚无疆，兆姓之福田永赖。”^⑦ 即为母亲祈寿，为百姓祈福。巡游五台山被人认为是进香拜佛，其一般意义也在于此。^⑧

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现身演教之所闻名，康熙帝对于这一圣地情有独钟，究竟是什么原因将清朝帝王与这座山连结起来呢？这还要从满洲与西藏以及蒙古的关系谈起。清征服漠南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得到元朝流传下来的象征传承中国治统的传国玉玺，于是满、蒙、汉官员联合向皇太极请上尊号，建国号大清，改元为崇德。因此，清朝是以满洲为中心，联合蒙、汉的政权，具有了一定接续中国治统的正当性。

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极同时还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喇嘛八思巴用千金所铸护法战神固尔嘛哈噶喇佛，用三年时间于崇德三年（1638）建成实胜寺奉祀，象征着清朝得到了蒙古护法神的护佑，清朝非常重视。寺成，在寺的东西两侧，建石碑二。东侧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侧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土伯特字。^⑨ 昭示着清的建国，得到了汉、蒙、藏信奉的佛教的护佑，也接续了元以来的佛教统绪。然而，拥有该佛还是不够的，蒙古信仰藏传佛教的喇嘛教，为了得到蒙古的服从，清还需要得到喇嘛教教主达赖喇嘛的正面支持。崇德二年，皇太极拟邀请达赖喇嘛，得到喀尔喀蒙古的支持，崇德四年派出了使臣。崇德七年十月初二日，达赖的使臣到达沈阳，受到皇太极的隆重接待。使臣宣读了达赖喇嘛及西藏藏巴汗的来书，^⑩ 翌年五月初五日，使臣返藏，携回皇太极致达赖喇嘛等的敕书，从此清与达赖喇嘛建立起了正式的联系。在与顾实汗的信中表示：今欲到西藏敦礼高僧故遣使与西藏使臣携行，“不分服色红黄，随

①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第4—7页。

② 孟森：《世祖出家考实》，《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16—247页。

③ 《射虎川台麓寺碑》，《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4，第1册，第668页上。

④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3《崇建》，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第188页。

⑤ 《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4，第1册，第669页上。

⑥ 《五台殊像寺碑》，《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二集》卷34，第1册，第670页上。

⑦ 《五台山棲贤寺碑文》，《圣祖仁皇帝御制文第三集》卷24，第2册，第983页下。

⑧ 张羽新认为：“康熙这多次的参禅礼佛活动，目的都是要祈求寿福，反映了康熙内心深处对喇嘛教的迷信与崇奉。”（张羽新：《康熙在加强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是如何对待喇嘛教的？》，《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2期）

⑨ 《盛京莲花净土实胜寺建成皇太极亲往行礼赏赐》，崇德三年八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3页。

⑩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1—7页。

处谕访，以宏佛教，以护国祚”。^① 顾实汗则遣使建言：“达赖喇嘛功德甚大，请延至京师，令其讽诵经文，以资福佑。”^② 此议获准，这是清对于达赖的正式邀请。顺治九年（1652）九月初三日，清帝谕旨解释了这次邀请的目的：“以外藩蒙古惟喇嘛之言是听，因往召达赖喇嘛。”^③

达赖喇嘛于顺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到北京南苑，十年二月二十日辞归。达赖喇嘛得到了清的正式封号，而清帝也得到了藏传佛教的认可并给予崇高的称谓。在此前后西藏政教首领给顺治帝的信件反映了这一情形，顺治九年五月初一日《第巴为迎聘达赖喇嘛赴京事奏书》的抬头是：“第巴谨奏至上文殊菩萨圣主陛下”，是为目前能见到西藏政权称呼清帝为文殊菩萨的首封奏书。顺治十年三月二十八日，达赖喇嘛请安奏书这样写抬头“达赖喇嘛致金光四射、银光普照、旋乾转坤、人世之天、至上文殊菩萨大皇帝明鉴”，^④ 则是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称呼清朝皇帝为文殊菩萨的第一封奏书，即藏传佛教视清朝皇帝为文殊菩萨。

康熙帝延续了文殊菩萨的称谓。十七年十月初一日，五世班禅问安奏书也称康熙帝为“文殊皇帝”。^⑤ 有的书信将康熙帝说成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如第巴桑结嘉措谢赐缎匹等物奏书赞誉道：“造福万世，主宰天地，文殊菩萨之化身，永握权柄，利济众生。”^⑥ 喀尔喀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奏书称：“执掌佛教文殊菩萨化身普通二法成就一切皇帝陛下。”^⑦ 既然清帝被藏传佛教尊为佛，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康熙帝到五台山礼拜真正文殊菩萨的道场，则最能得到文殊菩萨的护佑。足以彰显清帝对于佛教的虔诚，以及更灵验地为家国民众祈福了。

康熙帝对于五台山的重视，还因为五台山对于蒙藏汉各族的重要性。藏传佛教第五代祖师八思巴曾到五台山向文殊菩萨祈愿，元代铸就的嘛哈噶喇佛，最初就奉祀于五台山。^⑧ 受八思巴的影响，元代以来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向往的圣地。五台山位于汉蒙交接之处，又当西北进入华北孔道，明代喇嘛教进入五台山，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共享的宗教圣地，其影响力遍及汉蒙等民族。康熙三十六年，西藏第巴说：“北方一带，汉人、蒙古皆敬礼达赖喇嘛索纳木札木错宗喀巴之法。”^⑨ 即北方人信仰喇嘛教之中的宗喀巴黄教，五台山的寺庙有青、黄之分，和尚多穿青衣，所在寺庙为青庙；喇嘛衣着多为黄色或红色，居黄庙。据说明永乐十二年（1414），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至五台山，兴建了5座黄庙。明代的大文殊寺在清顺治年间由青庙改为黄庙，寺名改称菩萨顶。康熙帝于二十二年把台内10座青庙改为黄庙，菩萨顶成为五台山黄庙体系的首庙。由于五台山礼佛最重要的场所是菩萨顶，因而象征着高度重视喇嘛教。雍正年间，五台山有26座黄庙。^⑩ 可知从康熙帝开始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较快。康熙帝五台山礼佛，便会得到佛教特别是喇嘛教信徒的拥护。

顺康时代清廷建立起管辖五台山的制度。阿王老藏，俗姓贾，京师西山人。十岁出家藏传佛教的崇国寺。顺治十年西天上士赴诏入寺，摄斋受戒，顺治十六年“以兼通番汉乘传上主五台，总理番汉事务，食俸台邑。……自老人莅众兹山，乳窦重流，荆条复茂，建道场以报国。”^⑪ 至康熙十年年逾七十，退居颐养。二十二年秋，康熙帝巡游五台山，御笔题赐“清凉老人”。二

① 《清太宗实录》卷64，崇德八年五月丁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89页上。

② 《清世祖实录》卷2，崇德八年九月戊申，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页上。

③ 《清世祖实录》卷68，顺治九年九月壬申，第530页上。

④⑤⑥⑦⑧⑨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合编：《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第23、34、76、111、128—129、3、190页。

⑩ 崔正森：《五台山佛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3期。

⑪ 蒋弘道：《清凉老人阿王老藏塔铭》，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7《高僧下》，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第380页。

十六年圆寂。阿王老藏的后继者为老藏丹贝，他本蒙古人，生于天聪六年（1632），入卫籍为赵氏，居京师，礼师崇国寺，又曾师吐蕃沙门蓝建巴，至清凉山，居中顶及罗睺寺数年。后又远涉吐蕃、蒙古，于其语言文字无不通晓。复自五台山归崇国寺。其师阿王老藏住持清凉山，翌年他亦挂锡五台山。康熙十年奉敕继任督理五台山番汉大喇嘛，二十二年，康熙帝巡游菩萨顶奖赉有加，不久奉命监修五顶寺庙，悉力殚思，恭恪从事。二十三年“复以陈请菩萨大殿改覆碧琉璃瓦，自山入都，跋履艰辛，遂成劳疾，偃卧崇国，蒙恩日遣御医调治。”^①当年圆寂。从清廷任命藏传佛教人士管理五台山来看，传达出清廷对于藏传佛教的信任以及借此扩大在蒙古人中影响的信息。

康熙帝巡游五台山之后，菩萨顶寺庙大殿改用象征皇家的黄色琉璃瓦，二十三年在菩萨顶前后山门设兵永镇，把总1员、马兵10名、步兵30名，护守香火供器，菩萨顶实际上成了清朝的皇家寺院。二十六年，康熙帝差吴达禅“赉送香银、哈达到山，各寺修建上祝太皇太后延寿无疆道场”。二十七年康熙帝又差裕亲王等到山，“于菩萨顶赉送金银、宝珠、哈达外，与各寺银粮，修建报太皇太后慈恩道场”。皇帝为太皇太后建延寿、慈恩道场，二十九年，皇太后旨差太监首领郑开仕等人“赉送银粮、香烛、哈达到山，修建祈保当今皇上万寿无疆道场四十九日，圆满之日，合山僧众，均沾皇恩。”^②三十二年，皇太子、七阿哥、皇太后先后差人修建祈保康熙帝“万寿无疆道场”，特别是皇太后的长达“四十九日，圆满之日，设斋放堂，合山僧俗军民人等，均沾洪恩”。^③

二、康熙帝以及清廷的延寿祈福文化

由上可知，康熙帝五台山礼佛与为太皇太后、皇太后以及自己延寿祈福有密切关系。我们可就康熙帝以及清廷的庆寿文化加以论述。

康熙帝对于藏传佛教非常重视，特别崇信无量寿佛。无量寿佛，即“阿弥陀佛”，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佛人往生“西方净土”。据《哲布尊巴丹传》记载，哲布尊巴丹活佛曾为康熙帝传授长寿秘法及长寿佛之灌顶，并受戒。乾隆帝在《永佑寺碑文》中说：“我皇祖圣祖仁皇帝，以无量寿佛示现转轮圣王，福慧威神，超轶无上。”^④康熙帝被视为无量寿佛的转轮圣王。

五台山大喇嘛阿王老藏作有《五台盛事赞》：“圣驾登山喜异常，风云卷散宝幢香；寿高万载称无量，福衍三千拱大邦；社稷绵长开舜日，兆民安乐荷尧光；今朝不比蟠桃宴，八部天龙卫法王。”^⑤盛赞康熙帝到五台山为国泰民安而祝寿祈福。阿王老藏还分别阐发康熙帝到各台与福寿的关系，如东台：“今朝圣主亲临处，寿永山河福衍同”；西台：“登山圣主福如海，坐向文殊注寿筹”；北台：“九重福主登临地，寿与天齐满颂声”；中台：“圣境屡蒙天驻跸，寿山福海盛兴隆”。特别是菩萨顶：“大定乾坤歌咏盛，酬天谢地法门崇”。这些诗篇歌颂的是福寿齐山。

阿王老藏还作有《清凉老人谈经普说》，劝说僧人：“上祝当今圣主圣寿万岁万万岁，太子千

① 高士奇：《大喇嘛老藏丹贝塔铭》，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7《高僧下》，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第385页。

②③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3《崇建》，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第187—189、191页。

④ 转引自张靖文：《中国古代陶瓷质佛教文物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5年5月，第36页。

⑤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9《题咏上》，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第464页。

岁千千岁，三宫六院、后妃天眷、王众王妃增福延寿、安乐迎祥，合朝文武禄位高增、丹心报国、诚意忠良，家邦宁靖，天下太平，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兆民安乐，皇图永固，帝道遐昌，佛日增辉，法轮常转。”^①此文作于康熙十九年，反映了康熙帝与清廷对于五台山寺庙的诉求。

清朝制度，皇帝生日为万寿节，举行朝会，地方官亦行礼。“顺治八年定元日、长至、万寿圣节为三大节。又定岁遇三大节在外直省文武官，均设香案朝服望阙行礼，与京朝官同。”^②万寿节朝贺虽然延续前朝，然而清朝对于祝寿的重视，则具有特色。

康熙帝的生日是三月十八日，巡游五台山多在正月与二月之间进行，生日在巡游之后，所以官员祝寿自然就容易将这两件事情联系起来，配合皇帝巡游五台山为康熙帝诵经祝寿。四十一年三月，苏州织造李煦上奏：“恭请万岁万安。臣煦职守在苏，心驰阙下，闻圣驾临幸五台，不能伺候驱使，日深依恋。兹者恭遇万岁圣诞，不得随班舞蹈，特具奏折，叩祝万寿，伏愿乾坤永峙，日月俱长。”^③身在苏州的李煦，表示对不能扈从到五台山礼佛遗憾之后，向皇帝奉上了生日的祝福。

四十一年第四次巡游，四月二十九日，山西巡抚噶礼向康熙帝上请安折，说他于府、州、县、城池、闾阎大寺大庙内均令诵经，共祝圣寿。当地老少民人、绅士俱曰：“适才圣主临幸五台山时，我等之中凡不得往迎皇上者，各在本地虔诚诵经，共祝圣主万寿无疆……”还强调：“太原府省城老少民人、绅士、兵商人等自二月开始诵经，共五十余日，复恭逢万寿圣诞，通城唱戏悬灯，共祝圣寿。”^④为了给康熙帝祝寿，噶礼下令山西府州县寺庙诵经，还说太原府人民都在为皇帝诵经祝寿，其真实情况不得而知，但是噶礼逢迎皇帝则是明显的，或许也不无夸大之处。

非巡游五台山年份，噶礼也为皇帝祝寿。如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噶礼奏报：今年圣主圣诞，省城文武各官、闲员、书生、民人、商贾等于三月皆在圆通观诵经，共祝万寿无疆。他将省城诵经于衙门斗姆前行礼事项预先办妥，于二月二十五日起程赴五台山为万寿诵经祈祷。途中闻四公主为万寿来五台山诵经。他出雁门关迎公主，随至五台山，为皇上照惯例始于菩萨顶及各寺佛前拈香行礼，为万寿祈祷诵经。他起行于三月十五日至北岳恒山庙，“奴才亲自点燃镀金常明灯，叩祝万寿无疆，福与天齐”。^⑤四公主，即康熙帝第四女恪靖公主，康熙三十六年下嫁喀尔喀蒙古部土谢图汗之子敦多布多尔济。噶礼又到北岳恒山为康熙帝祝寿。十二月二十日，噶礼奏报，听说皇帝来年二月幸五台山，接着歌功颂德，说百姓得知该消息说，“一连九年丰登者，洵皆圣主深仁厚德，为民敬佛之意，感召天和所致。诚蒙圣主临幸，则我等得瞻天颜，共谢圣恩，洵属喜事”。据此，皇帝为民敬佛，导致山西连年丰收。不过康熙帝的朱批却是：“并

①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9《题咏上》，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第471页。

② 乾隆《大清会典则例》卷56《礼部·仪制清吏司·嘉礼·朝会一·御殿受朝》，《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622册，第1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49号《苏州织造李煦奏为祝贺万寿并报雨水菜麦情形折》，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第1册，第70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68号《山西巡抚噶礼请安并奏雨水粮价情形折》，第264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106号《山西巡抚噶礼奏报万寿圣诞诵经祝贺折》，第508页。

未传谕巡幸五台，矧五台地方甚窄，众人齐集则无处坐立，此事断不可。朕闻此更无心去了。”^①否认这一消息，同时披露出嫌五台地面狭窄，众人齐集无处坐立的想法。

四十九年第五次巡游五台山前后，康熙帝与山西巡抚苏克济有所互动。正月二十四日，康熙帝谕山西巡抚苏克济：“数年以来，朕曾欲谒五台山，但耽搁未去。今年为皇太后七十诞辰。现正无事之际，朕将往谒。”^②三月初十日，苏克济奏报在五台各庙念经祝寿情形，说他洁身斋戒，于五台之菩萨顶、射虎川、御花池、显通寺、殊像寺、白云寺等庙、平常各庙及北岳恒山庙，叩祝万寿无疆毕，皆开始诵经。他返回途中，见城池乡村闲员、书生、兵民、商人皆于寺庙诵经、唱戏，拈香求祝圣主万寿无疆。太原等五府、三州属地，亦在各寺庙诵经，唱戏，祷祝圣主万寿无疆。他“向省城内圆通观等寺庙及奴才衙门所祀观世音菩萨，讽诵《灵枢经》，祷祝圣主万寿无疆，福与天齐”。^③苏克济为康熙帝祝寿五台山、恒山以及太原府各寺庙都被要求诵经、唱戏，祷祝皇帝长寿，苏克济说他自己也亲自到庙里讽诵经书。

康熙帝之后，又有乾嘉二帝效法之举，也反映出作为家法的巡游五台山所具有的特性。乾隆皇帝六次巡游五台山，乾隆十一年（1746）、十五年、二十六年三次都是“奉皇太后”进行，特别是二十六年为皇太后七旬大庆，此后又有四十六年、五十一年、五十七年三次巡游五台山，其中五十一年巡游五台，至灵鹫峰文殊寺，御制七言律诗一首，译出满洲、蒙古、西番字。于文殊寺内建立四方石幢一座，镌泐四样字体。命将满洲字刻于碑之东面，汉字刻于南面，蒙古字刻于北面，西番字刻于西面。《御制至灵鹫峰文殊寺诗》曰：“开塔曾闻演法华，梵经宣教率章嘉。台称以五崇标顶，乘列维三普度车。縈繆抒诚陟云栈，霏微示喜舞天花。曼殊师利寿无量，宝号贞符我国家。”^④以曼殊师利延寿佑国的追求跃然纸上。嘉庆十四年（1810）十二月初一日，山西巡抚初彭龄奏请皇帝巡游五台山，说道：“五台为文殊师利道场，梵宇琳宫，久昭灵应。乾隆二十六年以后，高宗纯皇帝屡举时巡盛典，为民祈福。”^⑤嘉庆十五年三月十六日，兼护山西巡抚、布政使素纳奏称：五台山“其殊像寺、菩萨顶、塔院寺、显通寺、罗睺寺、寿宁寺、玉花池、大螺顶、镇海寺、普乐院十处，皇考高宗纯皇帝前曾屡次亲临为民祈福”。嘉庆十六年，嘉庆皇帝也巡游五台山。在清朝地方官看来：“五台系奉佛名山，中外瞻仰。荷蒙皇上俯鉴臣民望幸之心，允准于明年三月谒吉亲临，为民祈福。”^⑥这样，“为民祈福”也就成了清朝巡游五台山标榜的政治文化。

三、御书、御碑、山志与圣山的再建构

康熙帝的巡游，对于五台山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凉山新志》说：“皇清康熙二十二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49号《山西巡抚噶礼奏报士民感激蠲粮赈济折》，第556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58号《山西巡抚苏克济奏报在五台各庙念经祝寿折》附上谕一件，第668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258号《山西巡抚苏克济奏报在五台各庙念经祝寿折》，第667页。又，文中“灵枢经”原文加拼音“deo mu de jing”，系音译。笔者推测当译为“斗姆的经”，方与前文“讽诵”语句通顺。斗姆，即斗姆元君，道教崇拜的女神。斗，指北斗众星；姆，为母，斗姆即北斗众星之母。

④ 《清高宗实录》卷1250，五十一年三月戊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6册，第805—806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嘉年间五台山寺庙行宫修缮工程史料（下）》，《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嘉年间五台山寺庙行宫修缮工程史料（下）》，《历史档案》2001年第4期。

年圣驾巡历清凉山，琳宫梵宇遍加修葺，洒翰赐额，流辉五顶，勒铭刊碣，永垂忆褫，诚为千古旷典。”^① 扈从康熙帝的高士奇记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上亲题御书，分赐诸寺，天章瑰丽，炳烛名山，隆古所未有也。”^② 前引二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康熙起居注》也提到康熙帝向五台山发帑金，修寺宇，“而御书匾额，以次颁布，珠林紫府之间，烂若云汉焉。”^③ 给予康熙帝赏赐御书匾额高度重视。

事实上，康熙帝自幼练习中国书法，亲政后希望身边常有内廷翰林侍值，于康熙十六年设立南书房，主要用来讨论经史、研习唐诗，书法研习活动也较频繁。十七年五月初十日，康熙帝召高士奇至懋勤殿，侍帝书“五台圣境”四大字。廷臣张英称赞“落笔苍劲，结构严密，真足藏之名山，昭垂不朽”。^④ 康熙帝差吴达禅、那尔泰到五台山菩萨顶送去御笔“五台圣境”匾额。二十二年二月，康熙帝首次到五台山，敕封清凉老人，又赐御笔“斗室”匾额。御驾东回，康熙帝“随差大人偏峨、佛保二位领各行匠役到山各寺度量尺寸，以便赐匾赐幡。”^⑤ 据《清凉山新志·崇建》记载，康熙帝所赐“御书匾额”，有51个之多，如此众多的匾额，可以说改变了五台山重要寺庙与名胜的名称题名，从而使五台山披上了康熙帝及其代表的清代皇家面纱，康熙帝想要表达的是对于五台山代表的佛教圣地的重视，以及他的中国文化素养。这其中菩萨顶的灵峰胜境、五台圣境的御题不仅保留至今，而且成为五台山的标志性符号。

《清凉山新志·崇建》还记载康熙帝为五台山诸多寺庙写了碑文。御制碑文有南台普济寺、东台望海寺、东台演教寺、北台灵应寺、西台法雷寺、菩萨顶大文殊院、射虎川台麓寺、殊像寺、碧山寺、台麓寺、罗睺寺、涌泉寺、广宗寺、显通寺、棲贤寺、中台菩萨顶、白云寺等17块碑文，赏赐于五台山有关寺院，表明皇帝对寺庙的支持，进一步提升这些寺庙的地位。其中康熙三十九年殊像寺、碧山寺碑文，四十年台麓寺碑文，四十一年罗睺寺、四十四年涌泉寺碑文，四十六年白云寺碑文，均由来自内廷的刻字高手“内务府序班”梅裕凤勒石美化，^⑥ 可见康熙帝对于自己的书法在公众中的口碑是很在意的。

可以说，御制碑文与御书匾额重新包装了五台山，显示出皇家恩崇的新姿。

康熙帝对于五台山的热情还体现在写下了九首御制清凉诗。《清凉山新志·崇建》记载的御制清凉诗有：《自长城岭至台怀》《显通寺》《殊像寺法相最异》《驻跸灵鹫峰文殊寺》《天花》《登望海峰》《北台眺望》《娑罗树歌》《冬日重登清凉山》。如果说御书匾额突出的是书法才能，御制碑文彰显了文化水平，则御制诗体现了康熙帝的文学修养。这些都彰显了康熙帝对中国文化的传承。

值得注意的是，康熙帝较早出版了自己的诗文集。康熙皇帝二十二年二月首次巡游五台山后的八月十八日，翰林院覆给事中许承宣请镌御制诗文疏，认为允宜刊刻，颁赐中外。康熙帝征询大学士的意见，汉臣李蔚、王熙、吴正治同奏：“皇上圣学渊深，御制诗文允宜刊刻，垂示万世，中外臣民想望颁发者久矣。”满臣明珠奏称：“前科臣陈奏时，臣与汉诸臣在阁，即云皇

①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3《崇建》，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第179页。

② 高士奇：《扈从西巡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第1160页上。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073页。

④ 《南书房记注》，《历史档案》1995年第3期。

⑤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3《崇建》，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第184页。

⑥ 梅裕凤，文献中又写作“梅玉峰”、“梅玉凤”，对其人的有关研究，参见常建华：《康熙朝大内善刻能匠梅玉峰》，《紫禁城》2012年第5期；郭福祥：《康熙内廷刻字匠梅玉凤事迹补说》，《紫禁城》2012年第10期。

上御制诗文超绝今古，实应刊布，以慰天下之望。”康熙帝则说：“历代帝王诗文皆极其工美，然后刊布流传。朕万几余暇，留心经史，虽间有所撰者，岂能媲美古人？故向来从无刊刻之意。今既查前代俱有成例，姑勉从所请，颁发刊行。”不过，翌日康熙帝表示镌刻诗文集“意终未决”，大学士李蔚、王熙同奏：“皇上御极二十二年，御制诗文甚富，天下臣民仰望颁发，且从来帝王皆有自制文集，此事原非创行。况圣学宏深，实非前代可比，允宜刊刻，颁赐中外。”最终“上从之”。^①从起居注记载上述康熙君臣就出版御制文集的对话，生动反映出汉臣对于康熙帝崇儒重道“圣学”的认可，试图进一步形塑康熙帝成为圣君，而康熙帝对于出版文集可以作为“成例”接续历代帝王，乐见其成，其实也是向臣民展示御制诗文“工美”，换取臣民的仰望。康熙帝的御制诗文集包含了巡游五台山产生的碑文、诗歌，这些诗文得以传播广布。

康熙帝还注重用其他民族文字表达巡游五台山之举。康熙帝二十二年九月第二次巡游五台山后，翌年三月二十一日，召满洲大学士勒德洪、明珠等说：“朕前奉太皇太后诣五台山，祈求景福，览观山川形势，一一历观其地，每台各制碑文。今录出翻译满书与汉书并勒于石。其蒙古及土白特书，字句稍粗，间失行文本指，可令学士喇巴克等与石图等翻译，勒于碑阴，庶免淆讹。朕所撰碑文，一时结构未能精当，尔等可与汉大学士等详加修饰，斟酌尽善……”^②这是极为重要的举动，满汉文并书含有满汉一体之义，与背阴并刻蒙藏文，意味着满汉蒙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共治的政治理念。翌日，大学士、学士缴御制五台山碑文五道，一片赞扬。李蔚等认为：“体裁正大，辞旨典雅，一字一句咸极精纯，尽善尽美，洵足辉映万古。”王鸿绪认为：“五篇碑文内，便寓皇上仁被天下至意。虽言佛教，而儒家治平之理包括已尽。”汤斌说：“发挥象教而归本仁义，议论正大，真天壤间大文。”^③于是康熙帝命翰林院翻译。从汤斌、王鸿绪的奏言可以看出，儒臣是要把康熙帝佛寺碑文的意旨归结到儒家思想上，指出碑文蕴含着儒家的治平之理与仁义之本。如读碑文，也确实能感受到儒家的政治观念。明清之际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观念更加普及，就清廷积极利用、接受儒释特别是喇嘛教来说，信仰之间的融通，有利于满汉蒙藏支教的交流与融合，并非部分新清史学者所主张的满汉对立的思维模式。

康熙帝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更体现在《清凉山新志》上。五台山山志，清以前有四部“传”一部志，即唐高宗龙朔二年（662），会昌寺沙门会曷所撰《清凉山略传》一卷；唐高宗永隆元年（680），蓝谷沙门慧祥所撰《古清凉传》二卷；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妙济大师延一重编的《广清凉传》三卷；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无尽居士张商英记述的《续清凉传》二卷。明神宗万历二十四年（1596），五台山高僧镇澄法师修撰的《清凉山志》八卷。清初阿王老藏又在镇澄《清凉山志》基础上稍作补修。阿王老藏于顺治十六年奉敕入住菩萨顶，以“总理番汉事务”僧职统领五台山，顺治十八年志成。顺治间老藏丹巴随祖师阿王老藏至菩萨顶住山，康熙二十二年皇帝朝台，敕封他为“清修禅师”，钦命督理五台山番汉大喇嘛，并赐提督印。相对明代来说，清初五台山佛教有了新的发展，增加了新的内容。老藏丹贝重修新志。《清凉山新志》十卷，分为化宇、原圣、灵跻、伽蓝、崇建、显应、外护、高僧、缘感、题咏十个篇目，与镇澄志无异，分卷编次则不同。卷三《崇建》增补了清代顺治、康熙年间遣使修建道场法会、巡幸、供养、赏赐等内容，此书有康熙四十六年刻本。^④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050—1051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156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康熙起居注》，第2册，第1157页。

④ 冯大北：《五台山历代山志编撰略考》，《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清凉山新志》突显了康熙帝对五台山的高度重视。开篇就是康熙皇帝的《御制清凉山新志序》，接着是《清凉山图》，然后是前面提到的五台山御书匾额、御制碑文、御制清凉诗，再下来是阿王老藏的《旧志序》、老藏丹巴《新志序》、《清凉山新志标目》，共同成为了卷首。正文10卷则延续了《清凉山志》的体例与基本内容。《清凉山新志》显示出强烈的“御制”色彩，老藏丹巴《新志序》说到，康熙帝二十二年驻蹕五台山，“亲御彩毫，分题各顶，天章睿制，昭回星汉之光；金钵宝珠，层叠珍奇之锡；布昭圣武，台麓开射虎新川；垂护刹杆，真容换黄螭瑞瓦。况夫灵修圣果，古迹加新，以至妙咏英文，后来益胜。凡此旧志之未备，皆我朝所未修，乃据前书，爰加缮述。”^①将御书匾额、御制碑文、赏赐台寺、建台麓寺、换真容寺螭瓦等事，古迹、诗文益胜，旧志未备，清朝未修，故修新志。以新朝御制续写了五台山志。

乾隆皇帝更进一步，官修《钦定清凉山志》。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命军机大臣派员重修山志22卷，包括圣制、天章、巡典、佛迹、名胜、寺院、历代崇建、灵感、方外、历代艺文、国朝艺文、杂志、物产13个条目。“新志增补了很多旧志所无的资料，如卷1、卷2收录了康熙、雍正的御制诗和碑文，远比《清凉山新志》的内容多。卷三至卷六收录乾隆御制诗文，其中诗歌占了很大的比重。卷七《巡典》记载了顺治、康熙、乾隆三朝遣使修建道场、巡幸、供养、赏赐、赋役蠲免等情况。”^②乾隆帝继续突出清廷对五台山佛教的尊崇。

四、巡游五台山过程中的多元活动

巡游五台山除了康熙帝以礼佛影响蒙古之外，还邀请蒙古贵族一起参与。三十七年的第三次巡游五台山，掌管漠北蒙古喇嘛教事务的活佛折卜尊丹巴库图克图、蒙古瑚瑚脑尔亲王、青海蒙古亲王扎西巴图尔（又作“达什巴图尔”）等一同随行，二月九日一起入普济寺，参观清凉石，又入南台、古南台等庙，游览毕驻蹕菩萨顶。十日，一起游览妙德院等庙，仍驻蹕菩萨顶。十一日，一起游览羽化池等庙，康熙帝回銮，蒙古王公随驾至五台县白云寺，扎西巴图尔亲王等辞行，说他率属来朝，“兹获随幸五台，俾臣得以常侍上侧，途中频沐赐赉，有加无已，过叨圣主浩荡弘恩。”^③起居注官还记载说，亲王言毕，进捧康熙帝膝，呜咽不能起，众前挽其手而出，涕泣至门外，乘马俯首拭泪而去。真是依依惜别，难舍难分。起居注官年终评论说，扎西巴图尔亲王等“愿子孙世世永宁西陲”，^④反映出康熙帝蒙古政策的作用。

巡游五台山的归途要考察治水河工。三十七年归途中，康熙帝从保定上船，沿水路考察了清苑县、新安县、霸州、固安县等处河段，回宫后第三天便作出了治河的决定，^⑤实地考察对于这一决定显然有促进作用。四十一年巡游归途中，巡视子牙河，巡视郭家坞村新修堤工，就河道总督张鹏翮“请建立石闸随时启闭可省每年开渠引水之费而于漕运甚有裨益”^⑥的建议，下部议行。四十九年，康熙帝同样考察了畿辅河工。

①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第80—81页，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按：老藏丹巴《新志序》所署时间为康熙三十三年，白·特木尔巴根先生指出当是二十三年之误，参见白·特木尔巴根《〈清凉山新志〉及其相关著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

② 冯大北：《五台山历代山志编撰略考》，《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③ 《清朝起居注册·康熙朝》，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9年，第11册，第6239—6242页。

④ 《清朝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2册，第6839—6840页。

⑤ 《清圣祖实录》卷187，康熙三十七年二月庚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册，第994页上。

⑥ 《清圣祖实录》卷207，康熙四十一年二月己卯，第3册，第108页下。

巡游五台山途中不忘射猎行围、练兵阅军。如首次巡游五台山返程中还在苑家口水打猎，即行水围。“行围水淀中。用三桨船百只，分左右翼，沿岸棹入，合围之际，水鸟群飞，鸟枪竞发，堕羽歼禽，不可胜数。”^①四十一年巡游五台山，去时，驻蹕房山县下村、易州唐胡村，均率诸皇子及善射侍卫等射。返回时，二月十九日将近祁州停围，率皇太子诸皇子及善射侍卫射，“又令直隶武官骑射”。翌日，“行于博野县城北道傍停围”，又率皇太子诸皇子射。^②四十九年第五次巡游五台山，延绥总兵李耀“一路随围”，^③可见康熙帝一行是一路行围。康熙帝通过巡游练习骑射，教育皇子不忘国策。而且在博野县城北，还亲率皇太子扶犁耕田，行走良久。教育太子重农，呈现康熙帝重农的形象。

巡游五台山时，山西、直隶以及其他地方的官员要朝觐、护驾，君臣产生互动。康熙帝经常赏赐随行以及地方上的官员、兵士。三十七年在菩萨顶，赐扈从大臣、侍卫、部院大臣官员及执事人等数珠、木碗并金莲花等物。四十一年二月十二日，巡游五台山归程将出山西，扈从大臣、侍卫、部院衙门大臣官员以至兵丁执事人等，俱赐素珠、木碗、香、“清凉摄授”印绢，赐山西巡抚噶礼御书“能礼纯素”四大字，诗二幅，总兵官俞益谟“坤岳虎符”四大字诗一幅，布政司、按察司、学院、道府、辞谢知县等俱各赐诗字一幅。又赐巡抚噶礼食，赐其母银鼠褂、貂鼠袍、噶礼冠服各一袭。十四日至长城岭下，噶礼率所属文武官员跪送，又赐噶礼貂帽、貂褂，总兵官俞益谟钉孔雀翎貂帽、貂褂，临汾县知县赵凤诏白金。^④康熙帝擅长书法，赐予官员书法作品，是很珍贵的礼物。赐予的貂皮服饰，也很珍贵。这些赏赐，密切了君臣关系。二十四日，御舟泊任丘县药王行宫对岸，还赏了水手银两。四十九年二月，康熙帝巡游五台山，山西巡抚苏克济急至直隶王快地方迎驾随行，康熙帝不仅每天“恩赏天厨珍味二次”，而且“又赏赐御用黑豹皮端罩、马、人参、火镰包、胶囊、墨、砚、水盛、鼻烟壶物，又赏酱山楂、喀尔喀退山羊等各色珍味。”^⑤苏克济表示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报皇恩。

巡游五台山时，也有君民的互动。首次巡游五台山，在直隶完县城南用餐时，“百姓观者无禁，赐以梁肉，召年老者使前，各赍白金一定，稚子亦赐制钱慰劳遣之”。^⑥有个叫蔡丹桂的人，在众中自言系县学生，康熙帝考他《易经》，丹桂奏言家贫，不能为生，康熙帝赐白金五两，金盘苹果六枚。勉励他努力读书，开卷有益。随行的高士奇看到“黄童白叟欢呼载道”，感慨系之。第二次巡游五台山，发白金300两、绵400觔，命山西巡抚穆尔赛分给所过地方贫民。四十一年第四次巡离开山西时，二月十二日，蔚州、广灵等县民数千人跪献万民衣，感谢数年来因饥馑之故蠲免钱粮，又发积贮米谷赈济，今逢皇帝巡视，众民会集公制万民衣，跪恳奏请接受。侍卫海青启奏，康熙帝以各处地方此等物件概不收受，百姓感恩之意悉知，婉言谢绝。^⑦十九日，前往祁州，中途数千人男女老幼执香跪迎圣驾，瞻仰康熙帝，皇帝遣侍卫传旨慰谕。起

① 高士奇：《扈从西巡日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第1165页下。

② 《清朝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7册，第9236、9238—9239页。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14号《延绥总兵李耀奏为圣驾巡幸口外请圣安折》，康熙四十九年闰七月二十一日，第3册，第20页。

④ 《清朝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7册，第9219—9222页。

⑤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559号《山西巡抚苏克济奏谢赏赐御用物件折》，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十日具奏，第668页。

⑥ 高士奇：《扈从西巡日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第1155页下。又该书《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本文中“一定”为“一錠（錠）”，第1帙第265页a。

⑦ 《清朝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7册，第9217—9219页。

居注官记载，百姓踊跃欢腾，莫不交相谈论：“我圣主念民生疾苦，不憚勤劳，远巡边塞，我等始得瞻望天颜，自古以来此等奇遇真属罕有。”^① 民众把亲眼目睹皇帝作为终生难忘的事情。康熙帝并不回避群众，得到了百姓的赞誉。

康熙帝不忘教育官员，如首次出巡五台山，山西巡抚穆尔赛、按察使库尔喀来朝，康熙帝谕巡抚穆尔赛等：“五台、繁峙、静乐、崞县等处地瘠民贫，尔等既膺简用，必持己廉洁，恪共职业，务期利兴害除，使民生各得其所，方副朕委任之意，不然罪有所归矣。”^② 促进君臣关系的融洽也是巡游五台山的重要内容。如撤销对官员的处分，第四次巡游五台山驻蹕满城县，谕大学士等：原任礼部侍郎田种玉来接驾，年已七十余，将其原降之级复还。此行驻蹕真定，还遣大臣致奠了已故原任大学士梁清标，表达对其怀念。四十九年二月，康熙帝巡游五台山，召山西巡抚苏克济入行宫“询问地方事情，详加训诲居官、保身之道”。^③ 苏克济则表示今后要持身清廉，拼死效力。

围绕巡游五台山，君臣间展开话题。五台山位于山西，康熙帝巡游五台山与山西巡抚互动较多。四十一年第四次巡游，时任山西巡抚噶礼与皇帝以奏折沟通信息。正月十三日，噶礼向康熙帝请安并奏报，五台山大喇嘛自京城返还，即遣班第往探路，表示“恭候圣躬临幸”，“通省士民皆于街道欢曰：我等曩蒙圣主屡免钱粮、赈救之恩，才得至今时，今皆得以安居乐业，实皆圣主施恩所致。诚蒙圣躬临幸，得以瞻仰天颜，叩谢圣恩，委实我等之大喜。”^④

四十九年第五次巡游五台山，还有康熙帝与直隶巡抚赵弘燮的互动。三月初五日，赵弘燮奏报雨泽情形，将气候适宜归于皇帝的巡游。^⑤ 赵弘燮不失时机讨好皇帝，巡游五台山成了政治话语。不过这也说得过去，赵弘燮扈从康熙帝去了五台山，皇帝还就如何战胜蝗灾指示他，所以他格外重视自然变化。赵弘燮说：“臣于今年二月内随驾五台，奉上谕：‘蝗蝻甚是紧要，着实巡查’”。^⑥ 于是送驾后，于三月初四日回署，即移行文武衙门、各道府、州县、卫所并五城御史、海子提督、顺天府严行稽查，兼委官役协查。延绥总兵李耀也在同年扈从皇帝五台之行，闰七月二十一日的奏折回顾了此事：“一路随围，仰沐圣慈，赏赉貂裘珍品食物不一而足。皇恩高厚，虽举家顶踵难报万一。”^⑦ 巡游五台山的活动，加强了君臣之间的互动，密切了双方的关系。

五、余 论

康熙帝五台山礼佛，是怀着一种轻松的心情进行的。清宫懋勤殿旧藏康熙帝密谕，有康熙

① 《清朝起居注册·康熙朝》，第17册，第9236—9237页。

② 《清圣祖实录》卷107，康熙二十二年二月丁酉，第2册，第94页上。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559号《山西巡抚苏克济奏谢赏赐御用物件折》，康熙四十九年三月初十日具奏，第668页。

④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59号《山西巡抚噶礼奏报雨雪粮价并恭候临幸折》，第260页。

⑤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37号《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各属得雨分寸折》，第2册，第784页。

⑥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658号《直隶巡抚赵弘燮奏报密云县微有蝗蝻萌动折》，第2册，第836—837页。

⑦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14号《延绥总兵李耀奏为圣驾巡幸口外请圣安折》，第3册，第19—20页。

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给宫内顾太监谕旨，告示在五台山的情况：

朕二十日抵菩萨顶，观清凉山层峦万叠，一涧周流，琳宫梵宇，古迹甚多，五峰插汉，石路逶迤，北台更为高迥，登临旷观，众山皆小，天风飒然，时方雪霁，千岫堆琼，至于松杉夹道，异鸟飞翔，佳境无穷，应接不暇，乃界内之奇景也。尔可传之各处，以知五台圣境之略也。^①

康熙帝被五台山的景色吸引，以“奇景”概括“五台圣境”，并令传示宫内。再如三十七年巡游五台山，起居注官记载在台顶的活动使用了“游览”一词，说明康熙帝的五台之旅，具有游览、散心的性质。当然，巡游五台山的性质远不止此。

皇帝巡游五台山本身就表明了重视程度。高士奇作有《扈从清凉山三首》，其中指出：“皇清一以眷，名区传自今。”^②点出康熙帝巡游对五台山的重要性。不过康熙帝五次巡游五台山既有各次的特殊性，也有其共同性。特殊性，即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经探讨过，这里谈共性问题。

康熙帝的后世子孙阐发了巡游五台山意义。元明以来，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的圣地，在清代最重要的庙宇菩萨顶是喇嘛庙，以其为首形成了黄庙体系。乾隆帝《海望寺》诗中说：“蒙古诸藩皆尊佛法重黄教，我皇祖于此建寺居于喇嘛，内外各扎萨克岁时来朝，允神道设教之意也。”把清廷重视礼佛作为倡导黄教以绥服蒙古看待。嘉庆帝也指出：“五台为曼殊师利成道之地。从前圣祖仁皇帝、高宗纯皇帝屡经巡幸。朕前有旨令该抚修治庙宇，以俟临莅。原以瞻礼佛相，为民祈福。且其地介处西北，蒙古诸部落赴山瞻拜者，每岁络绎不绝。銮辂经临，瓣香展敬，亦寓绥藩之意，非以侈游观也。”^③乾、嘉二帝的说法为认识清帝巡游五台山的意义做了注解。

由于蒙古信奉喇嘛教以及五台山的地理位置，康熙帝巡游五台山礼佛，达到了与蒙古宗教信仰认同并以喇嘛教为纽带连接满蒙的目的。我们的考察还阐明了清帝与藏传佛教的联系之点，在于为了控制蒙古必须取得西藏达赖喇嘛的支持，达赖喇嘛承认了清朝政权及其在中国的统治，称颂清帝为文殊菩萨转世，使得清帝取得了在佛教中的权力象征。五台山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便与清帝的关系密不可分。问题还不止于此，《清凉山新志》说：“文殊师利或云曼殊室利，梵夏之不同音也，此云妙德亦云妙吉祥。”^④文殊菩萨即文殊师利，为梵文manj usri的音译，即“曼殊室利”。^⑤上引嘉庆帝的说法“五台为曼殊师利成道之地”，钦定《满洲源流考》说满洲本部族名，来源于西藏来书称曼殊师利大皇帝或大教主，满洲实本于曼殊，乾隆帝又说满洲即“文殊”，是将“曼殊”作为“文殊”之音转。孟森先生认为其言可信，“因其部族称君为‘文殊’即满洲，因曰满洲国。”^⑥究竟满洲是否来源于“曼殊”即“文殊”，学界存在争论，姑且存而不论，“文殊”之于清朝满洲名称、皇帝之谓，^⑦国家的合法性甚为重要，则是确凿无疑。清

① 《掌故丛编》清圣祖谕旨一，第1页b。

② 高士奇：《扈从西巡日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60册，第1167页下。

③ 《清仁宗实录》卷212，嘉庆十四年五月丙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册，第851—852页。

④ 老藏丹巴：《清凉山新志》卷1《原圣》，杜洁祥主编：《中国佛寺志》第3辑，第96—97页。

⑤ 《宗教词典》之“文殊师利”词条，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第217页；《五台山旅游词典》之“曼殊室利”词条，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

⑥ 孟森：《满洲名义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第3页。

⑦ 孟森谓“清代宦官宫妾称至尊曰‘老佛爷’犹是此俗”。（《满洲名义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第3页）

帝到五台山礼佛实为国脉所系，正如嘉庆皇帝所说：“我朝肇基辽沈，国号满洲，而兹山供奉曼殊师利，同声相应，此中因缘真不可思议矣！”^①

康熙帝的五次巡游五台山，也具有为国、为民特别是为皇室祈福的目的。如嘉庆帝所说“原以瞻礼佛相，为民祈福。”还有为太皇太后、皇太后祈寿的内容，其实还包括皇帝为自身祈福的含义。特别是清帝的祈福发生在平定三藩、荡平噶尔丹之后，说是在感谢佛主护佑清朝也不为过。这种对祈求福寿的重视，既沿袭中国传统文化，也具有满族自身文化以及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

如果说以上多从宗教、民族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康熙帝御书、御碑、御诗以及五台山志的制作与公布，则在表达建构以汉族文化与儒家文化为特征的圣山。

本文开篇介绍德国籍学者柯丽娜对于美国新清史学者解释康熙帝上五台山是接续元朝的观点的批评，提出清廷实际上是自我合法化的尝试，希望在五台山用密宗的方式，继续历史悠久的汉族护国传统。本文支持了这些看法，更强调了康熙帝与包括巡游在内的儒家政治文化的传统。笔者认为，有的新清史学者将满汉对立起来且强调清朝满族统治特性的立场，导致看问题偏颇。从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来看清朝的国家特性，塑造多民族国家是清廷的追求，为此而制定政策的出发点是国家认同，从而达到多元一体的效果。如本文所述，清的建立契机始于征服漠南察哈尔蒙古林丹汗，得到元朝流传下来的象征传承中国治统的传国玉玺，于是满、蒙、汉官员联合向皇太极请上尊号，建国号大清。清朝是以满洲为中心，联合蒙、汉的政权，接续了中国的治统。皇太极同时还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时喇嘛八思巴用千金所铸护法战神固尔嘛哈噶喇佛，建成实胜寺奉祀，寺的东侧一碑，前镌满洲字，后镌汉字；西侧一碑，前镌蒙古字，后镌土伯特字。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也接续了元以来的佛教统绪，但是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清是以满汉蒙藏为主的多民族政权。康熙皇帝御制的五台山碑文，有五通是用汉文写成，译出满、蒙、藏文字，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刊布，接续了实胜寺的传统。康熙帝的做法又直接影响后世，乾隆帝于五十一年巡游五台山，《御制至灵鹫峰文殊寺诗》译出满、蒙、藏文，于文殊寺内建立四方石幢一座，分别将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于碑的东南西北四面。因此，清廷在对五台山的重视，建构了五台山的皇家色彩，所传达的信息是多方面的，基点是接续中国的治统，维护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性。清朝是大一统国家而非狭隘的满族政权。

此外，认识到清帝以及满洲之称与文殊菩萨的特殊关系，就自然理解康熙帝多次巡游五台山礼佛的行为了。只是不了解个中情由者难免生疑，恰有康熙帝之父顺治帝笃信佛教并作出家之想，便做出康熙帝到五台山看望出家的皇父一说。甚至在史学家已经考证出顺治帝病死火葬之后，仍执迷不悟。本文的意外收获，就是要祛除对顺治帝出家传说的迷惑。

〔作者常建华，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历史学院教授。天津 300350〕

（责任编辑：周 群 吴四伍 责任编审：路育松）

^① 颢琰：《清凉山记》，《五台山碑文匾额楹联诗赋选》，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80页。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the former holds that the Tuoba refers to the Xiongnu, while the latter regards them as originating from the Xianbei. The former argument states that the Tuoba derive from the offspring of a Xiongnu woman called “Tuoba” and Li Ling, a military officer of the Han dynasty who surrendered to the Xiongnu, an explanation that may be the result of the Xiongnu’s having gained control over the northern part of Dai state when Fu Jian asked the Gudu, Tiefu and Helian tribes to govern the area separately after Dai’s former ruler Shi Yijian was defeated by the Former Qin dynasty. Furthermore, the Xiongnu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Emperor Daowu’s founding of the state, so that the “Xiongnu legend” remained in parallel with the “Xianbei story” for a long time within the Tuoba. When Cui Hao was put in charge of compiling the dynastic history, he reclaimed the “Xiongnu legend” in order to cater to the Xiongnu Queen Helian and Emperor Taiwu. Although not included in *The Record of the Kingdom* (*Guo Ji*) due to the objection of the top officials of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the “Xiongnu legend” spread to the Southern dynasty and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Song Annals* (*Song Shu*). The change of names of the Northern tribes in middle antiquity was primarily driven by politics, complicated by multiple factors such as kinship, territory, and society. The way the “Xiongnu legend” was formed and circulated may be a case in point.

Offering Prayers: A New Exploration of Emperor Kangxi’s Patronage of Mount Wutai

Chang Jianhua (90)

The New Qing History emphasizes the view that the Emperor Kangxi’s patronage of Mount Wutai follows a Yuan dynasty tradition is open to discussion. Ever since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Mount Wutai has been regarded as a major center of Tibetan Buddhism.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most important temple at Mount Wutai, the Bodhisattva Peak, was transformed into a lamasery, marking the beginning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yellow temple (Lama Buddhist) system. During his reign, Emperor Kangxi made five pilgrimages to Mount Wutai to win over the Mongols, who followed Tibetan Buddhism, with a view to accommodating the Manchus, the Mongols, the Tibetans and the Han. In addition, Tibetan Buddhism had identified the Qing emperor as the incarnation of *Mañjuśrī* (*Wen Shu*), legitimizing his rule over China, and Mount Wutai was the home of *Mañjuśrī*. This w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Qing emperor and Mount Wutai. The emperor’s pilgrimages were made not only to pray for the people, but also for his mother, grandmother and himself. In the course of his pilgrimages, the emperor named many temples, wrote inscriptions and poems, and revised and compiled *Annals of Mount Wutai*. In short, the purpose of his patronage of the mountain was to construct a national form characterized by the unity in diversity of the Manchus, the Mongols, the Tibetans and the Han.

Colonial Power and Medical Spac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al Services in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1894-1945

Yang Xiangyin (106)

The Tung Wah Hospital, originally founded by local Chinese leaders in 1870, was the predecessor of 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TWGHs), which was a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hospital that exclusively provided Chinese medicine services. Because of the intervention of colonial power, the TWGHs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TCM space to Western one. Shortly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in terms of inpatient services, the TWGHs became a hospital offered Western medicine services only.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ture of TWGHs as a medical space has a distinct symbolic significance. It not only reflects the expansion of Western medicine and the overwhelming colonial power, but also shows the view that Western medicine was superior to TCM and its curative effects were gradually recognized and accepted by